

民粹主义的双重作用形式 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于海洋 高浩洋

【摘要】在外交政策语境中,民粹主义通常以意识形态及政治话语两种作用形式出现。当民粹主义作为一种“薄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相联系时,具有寻找敌人、反跨国主义、反全球主义的内在偏好。与之相比,作为政治话语的民粹主义本质上是政策制定者的一种策略选择,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唤醒受害者意识-提出排他性承诺-修正过错方行为”的民粹主义叙事逻辑,使外交话语带有再政治化及否定性特征。意识形态及政治话语构成了民粹主义两种基本的作用形式,二者既有所区别,又互为整体,其互动关系充满张力。将欧尔班及莫迪作为案例比较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后发现,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存在国别差异,但政治话语呈现出高度同质化特征。民粹主义的双重作用形式具有弱整体性的特征,二者共同发挥作用推动了外交体制的改造,鼓励了外交事务的公众参与,但其效能受制于国家实力与国家制度、传统外交机制及自身缺陷,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有限的。

【关键词】民粹主义;外交政策;意识形态;政治话语

【作者简介】于海洋,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法学博士;高浩洋,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12)。

【原文出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春),2023.2.187~201

拜登政府执政后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的若干调整,使民粹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迅速从主流政治、传媒与学术话语中消失。然而,民粹主义对外交政策丧失影响了吗?答案是否定的。莫迪成功连任印度总理,顺利开启了第二个五年任期;欧尔班·维克托赢得了匈牙利大选;勒庞比上次大选更强劲地挑战了马克龙……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领袖并未丧失其支持者,民粹主义影响外交的土壤并未消失。更重要的是,传统外交体制在叙事、动员和宣传方面在向民粹主义靠拢而非相反。理解民粹主义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影响外交政策以及外交政策对民粹主义因素的吸纳,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因为民粹主义的具体主张具有高度的本土性,所以在内容层面概括民粹主义极为困难。外交政策语境中的民粹主义更多被概念化为意识形态或政治话语两种作用形式。这两种作用形式彰显出民粹主

义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1];前者凸显了民粹主义在框定外交政策议题上的作用,后者则强调其工具属性。基于两种作用形式分析外交政策,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民粹主义在外交政策领域的效能及局限。

一、民粹主义影响外交政策的第一重作用形式:意识形态

在国内政治领域,民粹主义通常被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假定社会最终将分裂为两个同质化且对抗的群体——“纯粹的人民”(the pure people)和“腐败的精英”(the corrupt elite)。^[2]这种意识形态极度强调人民主权,将信仰人民、反精英主义与反多元主义视为核心主张,认为政治要为人民集体意志(general will)服务。^{[3]5-7}进入外交政策领域后,民粹主义通过将核心主张嵌入“厚意识形态”(thick ideology)^①,对外交议程发挥作用。

(一)民粹主义的“薄意识形态”实质

民粹主义在外交领域经常表现为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政策倾向,但是这种倾向的实质,在不同国家存在巨大的差别。根据卡斯·穆德(Cas Mudde)的定义,民粹主义属于“薄意识形态”(thin ideology)^②,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厚意识形态”存在明显的区别:尽管它本身存在诸如反精英、反多元等一系列价值主张,但始终缺乏一种能涵盖各种语境的核心价值。“这造成民粹主义既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又可依附于其他意识形态。民粹主义作为像变色龙一样的东西,能够随环境变化而变化。”^{[4][20]}在外交政策领域,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存在显著的国别及文化差异。因此,围绕着“民粹主义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这一命题,产生了两类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方认为民粹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总体上是相似、稳定、可预期的,绝大多数民粹主义外交政策都具有反移民、反全球化及反建制的特点。^[5]也就是说,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具有稳定性,其内含的价值主张会在外交政策中稳定地发挥作用。另一方则强调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脆弱性,认为它受到国家和地区背景及附着意识形态的约束。民粹主义并不必然导致某种外交政策取向,也不存在统一的影响模式。民粹主义对外交政策影响的研究重心应转向其具体背景以及附着的意识形态。^{[6][11-12]}例如,在考察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的外交政策后,菲利普·朱兰多(Philip Giurlando)认为,民粹主义外交政策与传统政党的外交取向出现了实质性决裂。^[7]维贝克(Verbeek)的研究则相反,他认为,即使是激进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执政,其特定的政策偏好也时常会被国家关切所压制。^[8]

约翰内斯·普拉格曼(Johannes Plagemann)与桑德拉·德斯特拉迪(Sandra Destradi)等研究者接受了中间立场^[9],他们尝试在概念化的民粹主义与外交政策间建立因果关系,但反复强调需要同时考察与民粹主义并存的其他“厚意识形态”,厘清二者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边界。实际上,民粹主义化的外交政策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会呈现出一种混合状态:一方面它反映了民粹主义“薄意识形态”的特征,受到具体情景的影响^[10];另一方面也具有某些明显的共同

特征^[11]。例如,欧洲国家的反欧盟或反欧洲一体化政策虽然都受民粹主义驱动,但反对的逻辑并不一致:匈牙利、波兰、意大利等国的民粹主义通常与本土主义及民族主义的“厚意识形态”相结合,从移民和难民激发的种族及文化认同角度反对欧盟。以法国梅朗雄(Melenchon)、希腊左翼联盟(SYRIZA)、西班牙“我们能”政党(Podemos)为代表的左翼民粹主义,则与平等主义、民主价值等“厚意识形态”融合^{[12][179]},从经济不平等的角度反对欧洲一体化。除左翼与右翼政治传统所蕴含的价值主张外,各国差异化的宗教信仰、政党偏好及文化传统都有可能作为某种“厚意识形态”,限制或鼓励民粹主义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

(二)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偏好的干预

在承认民粹主义“薄意识形态”实质的基础上,本文根据卡斯·穆德及扬-凡尔纳·穆勒(Jan Werner Müller)对民粹主义的本质理解,将信仰人民、反精英主义及反多元主义视作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核心区域。^③以此为基础,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将三种强烈的价值偏好嵌入外交政策,影响外交政策的议题框定。

1. 寻找敌人倾向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薄意识形态,包含了各种不同的价值诉求,信仰人民是其最大公约数。^[13]与传统民主理论当中的人民概念不同,民粹主义假定的人民不仅是均质且明显道德化的共同体,而且受到“人民之敌”的严重威胁。这一假定使民粹主义政策带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及对抗敌人的负面情绪,这在外交领域诱发了寻找敌人的政策取向。

民粹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相结合,把强烈而广泛的寻找敌人倾向嵌入外交政策,这造成了国内问题的外溢。“人民之敌”的范畴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对象,国内外的特定族群、宗教、文明、阶级及其跨国活动都可能成为敌人。例如,法国的国民联盟(RN)与德国的另类选择党(AFD)同为民粹主义在野党,二者都公开宣称移民、难民对民族构成了威胁,前者使法国政府在移民问题上放弃了怀柔政策,后者使德国从“欢迎难民”转化为“有限欢迎”。在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民族自决意识被认为挑战了

土耳其人的主体身份,埃尔多安首次公开承认土耳其存在“库尔德问题”^④,变相将国内外的库尔德人视作整体性的“敌人”,进而对叙利亚的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及其领导下的民主军展开越境打击。由于民粹主义者假定本国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受到外部敌人的明确威胁,这在国家间诱发了广泛且深层次的对抗情绪及行为。

2. 反跨国主义

根据卡斯·穆德的经典定义,民粹主义将社会划分为“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2],反精英主义成为识别民粹主义的重要标识。如果民粹主义者掌权,这种反精英主义立场将在外交政策中被扩大。对于民粹主义而言,敌人的角色与各国所面临的特殊问题相关;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国际规范等都可能被视为精英主义跨国勾结的产物,它们联手对国家主权及人民权益造成了严重的侵害。因此,民粹主义把抵抗各种跨国势力的“跨国干预”、找回国家自主性视为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义者所在国家类型不同,反抗的内容也有所差别。对于经济欠发达的部分民粹主义类型国家,外交政策中的反抗行为主要表现为反跨国公司、反美主义。^⑤尽管这两种倾向在亚非拉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并非民粹主义所独有的特征,但民粹主义者,尤其是那些与美国跨国资本关系密切国家的民粹主义者,喜欢强化此种倾向,表达他们对国内腐败精英与跨国资本及美国合作的愤怒。作为美国的贸易伙伴,菲律宾的杜特尔特政府与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府都曾将反美立场视为外交政策的基线。对于部分欧美国家而言,外交政策中的反抗对象则变成了“受野心驱使的”精英联盟主导下的国际组织及国际规范。以欧洲为例,欧盟成员国中民粹主义政党参政的比例几乎达到了一半。尽管西欧与中东欧的民粹主义者差异明显,但他们都把欧洲的共同体建设视为本国人民独立与自主性的敌人,积极推动主权由欧洲一体化机制回归各成员国,保护其文化身份的本土性。^[14]

3. 反全球主义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贫富差距拉大、身份认同缺失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民粹主义影响下的

外交政策具有不同程度的反全球主义特征。一方面,民粹主义者普遍存在受害者心理,对全球性问题造成的各种伤害极为敏感,不相信国际治理的正当性及效果,把全球化视为国家所面临危机的重要根源;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所框定的“人民”范畴相当狭窄,这阻碍了其对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的认同,产生了强烈的避责倾向,希望通过转嫁责任和惩罚性措施来弥补本国的损失。

在经济层面,各国民粹主义基本上都同意强化经济主权,利用国家工具干预和限制资本的全球流动,退出或修正各种全球经济体制以维护自身利益。一个对本国有利且无须承担义务的全球化进程,才是民粹主义者赞同的。在全球治理层面,全球性问题需要有效的国际协同治理,但民粹主义者对此持消极态度。他们更主张采用“国家回归”的方式解决治理缺失的问题。例如,法国民粹主义者发动的“黄马甲”运动,最终迫使马克龙政府放弃落实《巴黎协定》中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承诺,使燃油税增加计划归于失败。

二、民粹主义影响外交政策的第二重作用形式：政治话语

区别于意识形态框定外交政策的内在偏好,政治话语层面的民粹主义强调了其作为政策工具的属性。根据拉克劳(Laclau)的定义,作为政治话语的民粹主义表达了某种原始的人民身份,而且逐步得到了公众认同,这份认同的获得源于“人民”与“人民之敌”的二元敌对关系。^{[15]32-35}在外交层面,民粹主义被执政者发展为一种简单而强硬的话术,夸张地渲染“人民”受到迫在眉睫的外在威胁并保证会消灭这种威胁。

(一)民粹主义政治话语的叙事策略

政策修辞遵循一种工具逻辑:话语要为政策提供必要的政治和物质支持。民粹主义政治话语偏好摩尼教式(Manichean world-view)的二元世界观^{[16]89-92},用“人民”与“人民之敌”的对立唤起特定的公众情感,触发恐惧、焦虑、愤怒、无能或受害等感受,宣传本国受到国内外敌人的联合剥削和压迫。这种二元框架能够将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单化和个性化,减少复杂性、歧义和不确定性。^[17]在外交动员、

宣传及谈判过程中,很多政治家通过强化“唤醒受害者意识-提出排他性承诺-修正过错方行为”的民粹主义叙事逻辑,加强一般公众与外交的互动,提升外交工具的效能。

首先,唤醒受害者意识。民粹主义者深谙政治传播之道,知道简单直接的问题陈述和解决方案对于动员人数众多而缺乏政治训练的受众来说是有效的。^[118]虽然明知复杂的国际关系并没有简单易得的答案,民粹主义者仍然会在公开场合发表诸如“欧洲经济低迷的罪魁祸首是欧盟”“美国工作机会被中国偷走”之类的言论,意在通过具象化的政策描述,把复杂棘手的问题归结到一个外部敌人身上,借此煽动民众的受害者意识,为外交政策的政治动员奠定社会心理基础。

其次,提出排他性承诺。在唤醒群体意识后,民粹主义者往往通过针对“本国人民”的排他性承诺,为启动高强度的政治动员做准备。在外交政策中,民粹主义政治家常常表现出更为“自私”的特质,让支持者看到他们对本国和外国采取公开的“双重标准”;类似“本国优先”及让“本国再次伟大”的政治话语都暗含民粹主义的排他性特征。^[119]民粹主义向其支持者描绘了一个理想的未来,使其相信自己的处境能够因排他性承诺的实现而改善。这种承诺使人民愿意接受外交政策排他性带来的国际政治风险,更坚定地支持政府的外交决策。

最后,修正过错者行为。民粹主义话语假定“人民之敌”要对本国人民的困境承担所有责任,只有来自国外的敌人修正其错误行为,外交政策才能被视为取得了胜利。因此,民粹主义者普遍乐于对其他国际关系主体提出过分的诉求,借以塑造强者形象。外部“人民之敌”的后退,有助于民粹主义者实现其政治承诺,但这种外交实践层面的胜利并不总能发生。这使民粹主义更依赖语言层面的强势,来制造胜利的“幻影”。

(二)民粹主义政治话语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艾尔丹姆·赛迪莱克(Erdem Ceydilek)、吉恩·克里斯托夫(Jean-Christophe)与卡梅伦(Cameron)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证实,民粹主义话语本质上属于政策制

定者的一种策略选择。^⑥它在功能层面并未触及外交政策的实质,但对决策进程及效果产生两方面重大的影响。

一方面是外交政策的再(国内)政治化。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尽管其形成过程可以被视为国内政治的延续,但从结果来看,它回应的是国家如何应对外部压力的问题,具有“去(国内)政治化”的特征。^[120]外交政策也被假定是一种超越国内政治分歧、反映国家整体利益的对外实践。与之相比,民粹主义者擅长使用政治话语将外交政策“再政治化”,使之成为增加自己权势的政治实践。该策略的核心是把国内建制派精英与海外的联系再政治化及污名化,继而煽动社会的愤怒情绪。混合了民粹主义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的外交政策生成了一种新的“人民”概念:建制派“精英”与“人民”的纵向对立,民族主义“自我”与“他者”的横向对抗,共同构建了人民既是受害者也是国民(nation)的角色。^[121]这种做法与民粹主义长期以来边缘化的政治地位及其政治诉求相关:“民粹主义者将统治视为一场持久的政治运动”^{[122][21]},赢取更多的国内支持者、夺取及维护执政地位是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外交政策成为削弱政治对手威信、加强自身政治地位、基于特殊群体利益而非国家整体利益的一种干预国际关系的工具。

另一方面是外交氛围的否定化倾向。与传统意义的外交政策注重营造合作性和建设性氛围不同,民粹主义话语中表达的二元逻辑,使其对否定性话语形成了高度依赖。民粹主义者相信人民受到了现行国际秩序长期的剥削与压迫,因此经常采用“反……”的话语结构,表达对既有国际规制的否定态度。从反全球化、反区域主义到反美、反移民,近年来民粹主义者在外交方面的反对目标清单正在不断增加。当然,民粹主义的否定性表达更重视传递一种情绪,激发“人民”被政治迫害的紧张感^[18],因此,反对的具体含义经常是模糊的。齐泽克(Žižek)在评论2005年法国和荷兰对欧洲宪法计划的反对时指出:“这个反对具有混淆的、不一致的、多元的含义。它既强调工人权力的保护与种族间的和平共存,又

对威胁感知的盲目反应和变化充满恐惧,同时还夹杂了一些朦胧的乌托邦愿望。”^[23]可以说,民粹主义者并不总是采取激进的外交政策,但由于其将否定与反抗情绪的表达视为外交话语的重要使命,因此哪怕引起严重的言语冲突,也要公开和刺耳地表达其“受害者”意识。

三、民粹主义双重作用形式的互动关系

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与话语既有所区别,又相互作用,二者的互动关系(见图1)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弱整体性。这种弱整体性指涉,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在思想内核及政治目标等方面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共同对外交政策和外交体制施加影响,但由于民粹主义存在薄意识形态和强话语策略的显著特质,二者在外交政策中的嵌套具有随机性,与具体政策的黏性也存在差别。可以说,二者互动的松散性影响了其整体效能的发挥。

(一)双重作用形式的功能差异

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功能是嵌入厚意识形态,框定外交政策的偏好。在该意识形态中,人民与精英的对立是身份性的,而非领域性的。换言之,这

种压迫与反抗的二元关系可以发生在任何领域,但各领域的特殊性并不是民粹主义关注的焦点。作为一种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时,其任务不是对具体问题给出专业性的答案,而是把二元对立的身份结构嵌入具体问题当中。跨国领域的敌人是谁?复杂的全球化进程中哪些因素对“人民”构成了威胁?民粹主义需要向传统的左翼、右翼意识形态及各国特有的厚意识形态寻求答案,二者相互作用并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互构。这个过程就是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政策化的过程,各国外交政策民粹主义化的程度也受制于此过程的差异性。

与旨在参与外交政策塑造的意识形态相比,民粹主义话语的核心功能是进行政治宣传、政治动员及外交施压。首先,民粹主义话语的最优先功能是在外交政策实践中嵌入“唤醒受害者意识-提出排他性承诺-修正过错方行为”的话语逻辑。由于民粹主义话语承诺的胜利不总能在外交政策实践中获得,它更多表现为一种宣传策略,目的在于把各种政策结果都解读为胜利。其次,民粹主义通过宣传和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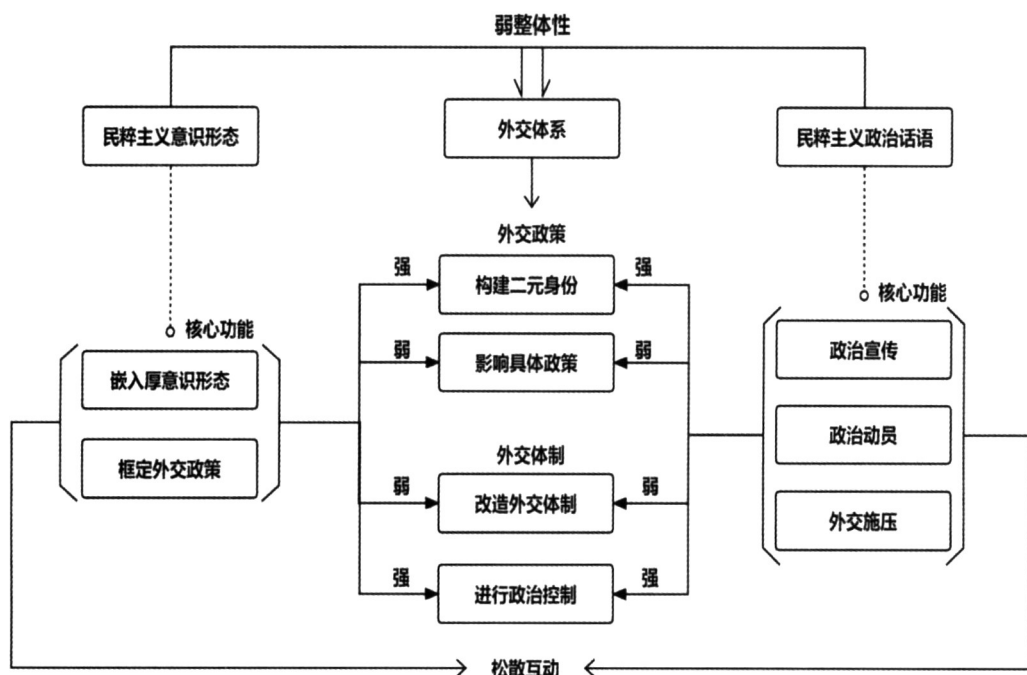


图1 民粹主义双重作用形式的互动关系

织,将其界定的“人民”群体团结起来,以多种方式向外交体制施加压力,使其接受民粹主义的话语逻辑;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增加了国家外交政策能够汲取的社会资源,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强了外交工具的效能。最后,民粹主义话语经常作为一种外交施压的策略存在。民粹主义公开要求其他国家“修正错误行为”,这种话语会加剧国家间紧张关系,但民粹主义往往迷信强硬的表态,相信恐吓与威胁有助于获得更有利的谈判地位。

(二)双重作用形式的松散互动

由于现实的外交政策必须考虑环境压力及成功概率,因此任何外交实践中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都无法保持完全一致。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在互动方面的松散性表现得更为明显。

一方面,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在外交政策中的嵌套有很强的随机性。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中的具体问题缺乏深刻认识,其与厚意识形态的嵌套也是混乱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无法提出完整且自洽的施政纲领,也无法把“人民”与“人民之敌”的二元关系具象化到每一个具体的外交领域及行动中,这极大削弱了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对政治话语的指导能力。民粹主义政治家需要对其意识形态无法涵盖的问题自由阐述。^{[24]365-377}英国脱欧时约翰逊(Johnson)的主张就经常在“协议脱欧”与“无协议脱欧”之间反复横跳。与此同时,民粹主义话语面临高度不确定和多元的外交环境,除了僵化的敌我对立思维和“能够赢”的强硬表态外,在很多问题上并不持特定立场,也无法总是追随其意识形态的倾向。民粹主义话语逻辑中的敌我关系是抽象的,对特定外交政策的表述则需要高度具体化,二者的嵌套带有很强的随机性。比如,在莫迪政府的话语体系中,中国既是印度崛起的假想敌,又是经贸领域的伙伴。民粹主义话语实际上利用其意识形态的空洞性,来寻求外交政策上的妥协空间。

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与外交政策的黏性存在差别。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与厚意识形态的耦合,在政治层面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民粹主义政治家需要与“腐败的外交精英”及决策部门合作,但本质上他们对建制派精英是不信任的,与

之合作也是为了加强对后者的政治控制。因此,尽管存在妥协,民粹主义政治家仍会强调其核心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中的优先排序;而在话语层面,民粹主义的工具属性则更为明显,“唤醒受害者意识-提出排他性承诺-修正过错方行为”的叙事逻辑,可以被任何准备实施强硬外交政策的国家借用。换言之,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尽管有弱意识形态的特点,但仍存在可以归类的政治诉求。而民粹主义话语拥有更强的普适性,未必与特定意识形态捆绑;如果仅将其理解作为一种有效的鼓动国内支持或对外施压的策略,那么建制派政治家的话语表达也经常同民粹主义者相类似。

(三)双重作用形式的弱整体性

相较于各种厚意识形态,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存在功能差异且联系松散。然而,民粹主义能够强势介入各国政治生活并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意味着双重作用形式对外交领域的影响是整体性的。

首先,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保持了一致的思想内核。无论话语层面还是意识形态层面,双重作用机制都描述了一个本国“人民”与“人民之敌”的二元对立国际关系模式。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与厚意识形态嵌套,话语则与具体外交实践融合,它们虽植入具体的议题领域,但对各种专业意见及解决方案缺乏兴趣;其关注重点是把受害者意识、强硬的政策倾向及获得胜利的政治承诺,嵌入外交体制与外交实践当中。

其次,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都主张对外交体制进行改造。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体制及官员,都有不同程度的跨国主义和全球主义倾向,因此很容易被民粹主义视为与国外势力勾结的“腐败”势力。尽管民粹主义对外交的影响存在国别差异,但只要民粹主义裹挟了民意,就会在人事任免、议程设定及政策实践等方面对外交体制施加影响。所以说,民粹主义与外交体制的融合,是建立在前者对后者的怀疑和控制基础上的;与后者的紧张关系,构成了前者内部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统一关系的基础。

最后,在履行“胜利”承诺这一大前提下,民粹主

义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关系的松散性,反倒有利于民粹主义真正贯彻到外交政策当中。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本质上是服务于国内政治目标的。作为当代政治光谱中的后发力量,民粹主义把进入政治核心乃至执政视为最高目标。由于没有建制派的深厚政治底蕴,民粹主义对“人民”的支持更为看重,也更害怕失败,具有很强的功利倾向。为实现胜利承诺,民粹主义在复杂的外交实践中无法完全照搬僵化的敌我二元论观念,需要保持更灵活的态度。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与话语的不同步性,淡化了其冲突性政治观的僵化属性,为其执行更现实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可能。

四、假设检验:匈牙利欧尔班与印度莫迪的外交政策比较

案例比较研究属于“由果溯因”路径(cause-of-effects approach)中常用的定性研究方法。^[25]本文进行案例比较的目的是校验民粹主义双重作用形式对外交政策的实际作用,即通过选择两个国情差异较大的国家,将其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及政治话语进行比较分析,解释民粹主义对各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时的差异性。因此,本文的案例选择标准有以下三点:1)两国的执政者必须为当前学术界公认的民粹主义领袖;2)两国的国情具有明显差异;3)两国的民粹主义领袖关注并干预本国的外交政策。经过筛选,匈牙利欧尔班政府与印度莫迪政府具备本文案例选取所要求的前期条件和相似背景^⑦:第一,两国领导人都属于公认的民粹主义者,且均获得了稳定的执政地位,与正在追求执政权的民粹主义政治家相比,已执政的民粹主义领袖的外交政策更能反映民粹主义双重作用机制对外交政策的实际影响。第二,两国国情差距巨大,匈牙利是欧盟成员国,青民盟具有浓厚的天主教背景,其对外政策主要在欧盟框架内实施,印度则是南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民主党具有鲜明的印度教色彩,正在追求大国地位。两国在地缘、宗教背景、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国情差异,有助于更全面比较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及政治话语在影响外交政策上的异同。第三,欧尔班和莫迪均对外交政策表现出巨大热情,乐于在各种国际场合表达自己对本国外交政策的意见。两位领

导人在公开场合的发言为外交政策的过程追踪提供了依据。

(一)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性

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嵌入外交政策,形成了寻找敌人、反跨国主义、反全球主义三种典型的政策偏好。然而,作为一种典型的薄意识形态,各国民粹主义实际上受其母国厚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二者混合塑造了现实的外交政策:欧尔班的民粹主义倾向与匈牙利国内深厚的天主教及民族主义传统相契合,外交政策中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倾向明显;怀有大国抱负的莫迪政府,在外交领域实用主义风格较为明显,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则稍显模糊。

1. 寻找敌人

在民族宗教结构相对单一的匈牙利,利用宗教力量和民族传统成为欧尔班构建民众身份认同的有效模式。^[14]对于欧尔班及其所在的青民盟而言,移民和难民尤其是穆斯林身份的移民和难民成为其明确框定的敌人。欧尔班认为,穆斯林难民不仅是潜在的违法犯罪者或恐怖分子,更是损害本国基督教地位的文化入侵者。^[26]出于排斥移民及难民的本土主义立场,欧尔班在面对2015年欧洲大规模的移民和难民潮时,不仅强硬拒绝了欧盟强制性的难民摊派配额,还从国内立法层面对《刑法》《国家边界法》《庇护法》进行了修改,旨在减少移民及难民的涌入。除此之外,欧尔班还以申根2.0行动计划为指导,通过在与塞尔维亚交界地区布置铁丝网、招聘边境猎人、关闭难民营等行动,使本国接收难民的数量由2015年的177135人锐减至2018年的670人。^{[27][22]}在印度,人民党的主要支持者来自印度教徒,他们与伊斯兰教存在历史恩怨及文化冲突。与欧尔班的强硬态度相比,莫迪有选择地缩小了身份排斥的范围。莫迪政府的穆斯林政策需要考虑其成为地区和世界大国的抱负以及印度参与缔造不结盟运动时就具有的国际主义传统。一方面,莫迪政府2019年正式通过的《公民身份修正法案》,从立法层面正式限制了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阿富汗三国穆斯林的移民资格;另一方面,莫迪政府频繁访问伊斯兰世界,试图与之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莫迪坚持宣扬印度

教文化,但从不宣称伊斯兰教对印度教构成威胁;他巧妙地将国内对穆斯林群体的敌意仅仅集中在强硬的巴基斯坦政策上,而且这些政策是以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名义做出的。^[20]

2. 反跨国主义

同其他民粹主义领导者相类似,欧尔班指责国内的建制派精英与外国行为体相勾结,是精英“民主化螺旋上升”现象的根源^[28],因而对国际组织及国际规范做出了更严格的限制。通过拒绝执行不利于匈牙利的国际规范、瘫痪国际组织机能与降低组织能力等方式,欧尔班的外交政策对既有国际规制(主要是欧盟)形成巨大冲击:除公开反对欧盟的难民摊派政策,欧尔班还阻止欧盟对国内建制派精英的支持,削弱与跨国公司利益相关人士(如索罗斯等)的影响力^[29];在对俄关系方面,欧尔班使用卢布结算俄罗斯天然气费用等行为,极大阻遏了欧盟建立反俄同盟的进程。相比之下,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虽然也主张“国家优先”,但在外交政策中也强调“团结博爱”理念。^[30]一旦民粹主义的反跨国主义主张与人民党宗旨相悖,莫迪就会将其完全抛弃。莫迪对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及国际规范都持积极友善的态度。资料显示,莫迪执政后流入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从2013年的280亿美元飙升至2017年的440亿美元。^[31]为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莫迪政府通过谋求联合国“入常”、深化在英联邦中的作用等方式,试图为本国贴上“精英俱乐部”(elite clubs)成员的标签。^[32]

3. 反全球主义

匈牙利民粹主义的崛起,与其深度融入全球化后不平等现象加剧有着密切关系。欧尔班上台后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为,当前全球化的核心价值观是虚假的,只有非自由主义才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匈牙利应当重组为民族国家而非自由主义国家。^[29]基于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欧尔班对经济全球化充满警惕,他公开表示:“当金融危机爆发时,匈牙利银行体系完全控制在外国人手中。他们告诉我们这很好,但是当危机出现时,我们需要完全听任他们的摆布。因此,我们不能失去国民经济的意识”^[33]。欧尔班不愿跟随欧盟的自由贸易政策,更青

睐经济爱国主义。在全球治理领域,欧尔班对全球性问题采取了避责和搁置处理的态度,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例,青民盟虽然对气候变化问题有科学认知,但在实践层面几乎不采取行动。^[34]与之相比,莫迪积极拥抱全球主义,把融入全球化作为印度迈向世界大国的必由之路。莫迪提出了“改革的多边主义”(reformed multilateralism)并将其作为参与全球治理的指导思想和重要抓手^[35];同时,积极加入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核供应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以及北极理事会等多边组织,主张融入并推动现有国际机制改革以实现印度利益。莫迪政府致力于在全球治理的多项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其积极举措包括:在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中担当“世界药店”,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药品援助;安全领域参与并组织维和行动;气候领域坚持“共区责任”,推进国际气候协定的达成;经济领域要求增加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和表决权,争做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等。

(二) 政治话语层面的相似性

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对欧尔班与莫迪外交政策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但两位政治家在外交话语中却运用了极为相似的叙事逻辑进行政策描述。

1. 受害者意识的建构

欧尔班与莫迪都习惯将人民的生活困境归咎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压迫,向其支持者灌输受害者意识。例如,针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欧尔班多次在公开演讲中将穆斯林难民定义为“侵略者”,认为这些外来移民提高了国内的犯罪率,抢走了本国人的就业机会。同时,欧尔班把矛头指向国内自由主义倾向的建制派精英,认为他们基于私利长期支持自由放任的全球化,导致匈牙利遇到了一系列问题。与之类似的是,莫迪也将国内的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归结为“国外政府或国外机构资助的世俗主义文化的腐蚀”^[19]。莫迪指责国大党在位时对内从殖民统治者那里很好地学会了分而治之的“艺术”,实施“王朝统治”,对外与前殖民宗主国相勾结,导致了印度人民的分裂和贫困。

2. 排他性承诺的提出

欧尔班和莫迪采用类似的政治话语和宣传策

略,使支持者相信领导人在带领他们从事一场必赢的比赛。欧尔班擅用历史类隐喻博取民众支持,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匈牙利签署《特里亚农条约》的历史耻辱反衬青民盟面对外交抉择时的艰难,以此唤醒民众的历史羞耻感和民族挫败感,展示其维护匈牙利民族尊严的决心。欧尔班把自己的主张聚焦为本国利益优先,将诸多排他性政策定位为“捍卫匈牙利的民族身份,维护基督徒的宗教身份,保护我们的家庭、社会以及自由”^[36]。莫迪同样强调本国优先的重要性,他明确承诺,印度要从国际社会中的“平衡性力量”(balancing power)崛起为“领导性力量”(leading power)。^[37]为了彰显印度的领导力,莫迪坚持以大国领导者的身份进行国际交往,强调被殖民主义剥夺的主权、身份、价值观及话语权正在随着国家的强大而回归。

3.“错误行为”的修正

欧尔班和莫迪着力塑造强者形象,在把国家的困境归咎于外部的他者后,二人都反复宣称自己有能力让对手的“错误行为”被修正。2014年,欧尔班在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演讲时表示:“几年前,谁曾想到匈牙利有魄力向外资银行和跨国公司征税,谁曾想到匈牙利敢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发回家……这些都是匈牙利经济能达到如此高度的原因”^[38]。在谈及匈牙利所获得的成就时,欧尔班认为,其中一项重要原因在于“没有像社会党执政时讨好外国资本,没有与左派及外国利益集团进行交易,而是与其进行斗争,走自己的路”^[39]。莫迪同样愿意在安全问题上彰显麻烦解决者的形象。当2016年面对与巴基斯坦的冲突时,莫迪强硬表示:“印军对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分子进行了外科手术式打击,这些士兵令他感到自豪”^[39]。而在中印洞朗对峙危机中,尽管印度的军事挑衅没能取得预期效果,莫迪仍然向国内解释道:“中印洞朗对峙的和平解决是印度政府政治成熟和外交胜利的标志,该危机的解决不仅强化了国家安全关切,还提高了印度在世界上的威望”^[40]。

五、民粹主义双重作用形式的效用

对欧尔班与莫迪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比较分析表明,民粹主义可以表现出足够的灵活性,在意识形

态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不同国家的民粹主义者在政治话语层面表现出巨大共性,最终使外交政策带有民粹主义色彩。事实上,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嵌入外交政策后,各国外交政策所呈现出的民粹主义化程度是不同的。一方面,民粹主义双重作用形式在外交领域产生了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双重作用形式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限制了其效能的实现。

(一)民粹主义双重作用形式的效用

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对各国外交体制的渗透存在程度上的差异,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由于民粹主义的双重作用形式在国内社会与外交政策间形成了常态化的干预通道,外交体制必须更多考虑国内民意尤其是传统意义上边缘群体的利益和诉求。

1. 对外交体制的改造

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没有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外交体制,其作用方式是通过改造既有体制实现的。这种改造因民粹主义在各国影响力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改造本身是可观察的。

在观念层面,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对外交政策合法性的涵义进行了修正。合法性本身包含统治正当性和民众承认两层涵义。^[41]传统意义的外交实践在合法性来源上,强调统治正当性,认为一个政党在获得执政地位后,其对外交政策的支配权会自然生成,具体外交政策无须逐一获得民众承认。在此基础上,传统外交更重视国际承认的价值,强调外交要获得其他国际行为体的认可。^[42]与之相悖的是,民粹主义严厉批评了外交体制对“人民意志”的漠视及扭曲,认为“人民”直接表达基础上的共同承认,才是政策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民粹主义得势后出现了对具体外交实践逐一进行“合法性”授权的趋势,这意味着公众审查对具体外交政策的干预更加频繁且制度化了。

在组织层面,民粹主义双重作用形式改变了外交体系的构成。传统外交体系是由职业政治家、专业外交官僚体系、政党、传媒巨头及各种游说组织构成的。这个体系相对封闭,具有稳健、专业及轻视一般民众智识与能力等特征。民粹主义由政治舞台的

边缘走向权力核心,带来了外交体制不同程度的重组。在民粹主义崛起的国家,被打上“极左/右翼”标签的政治和军事团体、新兴社交媒体中的意见领袖以及其他能发出足够音量的“边缘”群体,开始整合起来控制更多的选票,并渗透到政党、外交体制、智库等建制派组织当中。外交体系的变化与重组,使其相对于国内政治的独立性大大降低。

在偏好层面,民粹主义双重作用形式修正了传统外交议程的优先事项。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西方各国在外交领域形成了与经济全球化、西方民主联盟、多元主义配套的外交体制。民粹主义影响力的壮大,则使其主张的身份排斥、反跨国主义、反全球主义逐渐成为传统外交体制难以回避的议题。围绕着“可控的全球化”^[42]这一主题,民粹主义由一种边缘的声音转化为某种程度的政治现实。同时,各国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相互呼应,使很多议题在跨国范围内得到认同。比如,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对欧盟法院裁决的历史性挑战获得了中东欧国家的支持,欧洲议会内各国疑欧派议员的立法合作,也起到了类似作用。

2. 对公众参与外交决策的支持

传统意义的外交体制过于强调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忽视国内一般公众的情感和现实需要,这极大地削弱了其力量和正当性。民粹主义用激进甚至扭曲的“再政治化”方式将“人民”概念重新植入外交决策过程中,使当代外交政策发生了若干显著而切实的改变。民粹主义双重作用形式在贴近公众、激发社会情感及描绘理想化的政策愿景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它们通过附和并强化人民的不满,获得了传统体制无法忽视的政治力量。可以说,民粹主义的再政治化特征迫使各国的外交决策者正视国内的社会压力,外交政策与公众的互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民粹主义推动公众参与外交决策的方式主要是舆论施压及社会动员。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凝聚了社会边缘声音,使其成为占据道德高地的政策主张;民粹主义话语则借助社交媒体去中心化的“反……”话语结构,打破了建制派对于政治传播的垄断地位。受传统外交体制排斥的民粹主义者,通过社交媒体与民众展开直接互动^[43],最大限度地放大了边缘群

体的被排斥感和参政渴望。这些政治家和政治组织一旦获得参与外交决策的机会,就会迅速建构一条快速凝聚民意并传导政治压力的渠道。被动员起来的民众借用这条渠道,迫使外交政策制定者重视其立场和利益。

(二)民粹主义双重作用形式效用的有限性

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对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但与一切政治运动相类似,民粹主义在现实中会面临诸多条件限制并做出若干妥协。民粹主义双重作用形式的脆弱性,使纯粹和顽固的民粹主义缺乏生存空间。

1. 国家实力与国家制度的制约

对外关系不是单方面的政策输出,政策效果需要考虑到本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尤其是该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中强烈的二元逻辑,使其通过外交合作获得他国认可的可能性很低。面对强烈的抵制,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实际效果更加依赖国家的实力地位。国家实力地位的框定,使很多国家外交政策中的民粹主义因素不得不淡化,在很多场合不再具有典型的民粹主义特征。这也是莫迪在公开的国际场合更愿意以传统政治家形象出现、欧尔班面对欧盟压力时一再后退的原因。

此外,民粹主义的主张并不总能转化为国家的外交政策,政治制度的设定会限定双重作用形式发挥影响力的空间。以政党制度为例,从极端的多党制、温和的多党制到相对的两党制,不同国家民粹主义政党的活动空间随着政党力量分布的集中和政治共识的增加,呈现递减趋势。^[44]那些被排除在对外决策体系之外的民粹主义政党,只能通过街头动员等方式表达政策主张,这些主张很难上升为国家的外交政策选择。

2. 传统外交体制对双重作用形式的消解

民粹主义双重作用形式的弱整体性,使其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的联结强度不足。传统意义上的外交理念及制度反过来利用这一点,在有限容忍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使其被国家的厚意识形态吸纳。例如,西方的右翼保守主义可以在文明冲突、地缘扩张、贸易保护等多个问题上与民粹主义存在

契合点;拉美左翼也可以同样把自己的主张如民族主义、反帝、进口替代与反美、反跨国公司、反外部干预等民粹观点相结合。最终,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有很多机会被融入传统的权力冲突、利益竞争和意识形态斗争当中,成为传统意义上外交思维与体制的一部分。

民粹主义话语中二元逻辑的模糊性,同样为外交体制对其利用提供了空间。民粹主义势力需要传统的外交体制为其二元叙事背书,既有体系则反过来希望通过民粹主义话语的包装使传统外交议题获得更高的政治认同。通过向民粹主义力量学习,传统体制及精英逐渐开始熟悉与掌握民粹主义的话语策略并使之成为自己宣传和动员策略的一部分。比如,美国的传统精英依据霸权逻辑对中国施压,但如果强调“中国造成了美国工人阶级失业”的二元民粹逻辑能够加强美国民众对其立场的支持,传统精英也会鼓励该种话语策略。民粹主义当然不是西方外交体制走向刻薄和好斗的唯一原因,但民粹主义话语策略的扩散已成为我们理解西方外交政策动员机制的一个重要视角。

3. 双重作用形式的内在缺陷

民粹主义的具体内容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异,但其作用形式相对统一。即便不考虑那些具体主张所存在的问题,民粹主义双重作用形式的内在缺陷也限制了其政治效能的实现。

一方面,双重作用形式放大了外交政策中的非理性倾向。本杰明·墨菲特(Benjamin Moffitt)在总结民粹主义的本质特征时指出:“如果我们没有……危机,我们就没有民粹主义。”^[45]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用煽动性的方式宣扬不符合世界实际情况的敌我二元论,极大地助长了外交政策和实践中的冲突性与情绪化倾向。受民粹主义影响的外交政策很容易建构出超出合理范畴的受害者意识,并倾向于尽快实现“修正错误”的目标。这必然会破坏国际合作的气氛,削弱国家间的互信基础,降低外交政策的理性水平。可以说,民粹主义的扩散,尤其是各国外交体制对民粹主义话语的借鉴,极大地增加了国际体系的危险性和不可控性,使必要的外交妥协付出更高的成本。

另一方面,双重作用形式刺激了国家外交中的功利主义倾向。在从政治舞台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中,根基脆弱的民粹主义者必须营造出自己比传统外交精英更能干的氛围,追求立竿见影的短期收益,才能把更多人群汇聚在身边,对外交体制形成压力。由于经常对“人民胜利”做出过度的政治承诺,民粹主义既难以追求目光长远、行动稳健的外交目标,又对有时难以避免的外交挫折太过敏感。这使民粹主义化的外交政策有过度关注短期收益、偏爱政策投机的特点,很难推动国际体系真正有意义的结构性变革。

六、结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与经济全球化扩张时代相配套的政治体制和安全架构逐渐陷入停滞与危机。国际体系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冲突态势与民粹主义的发展相互影响,使任何国家都可能面对民粹主义带来的冲击。一切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都需要正视民粹主义渗透到外交领域所导致的险情及诱发的问题。

民粹主义化的外交政策本质上是内向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构成的双重作用形式,向公众灌输某种不亚于末世冲突的幻象,将国内面临的问题赋予道德含义,构建出虚幻的外部敌人^{[22]21-23},来转移国内政治危机带来的冲突压力。总体而言,民粹主义反映了国内和国际层面的深层次矛盾,给予了边缘人群对外交政策施加影响的可能,但是,它并没有提出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反而使被鼓动起来的民众与外部世界的冲突更为直接和尖锐。当双重作用形式嵌入外交体制后,本该起到隔离国内外矛盾作用的外交规制将部分失去效能,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的平衡也会被打破。民粹主义的双重作用形式给世界带来的撕裂,使全人类对共同价值有了更迫切的时代需要。各国在外交议程设置及实践中,只有重新正视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等重要理念的价值,站在增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高度,才能规避民粹主义陷阱,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

注释:

①“厚意识形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与“薄意识形态”

相比,“厚意识形态”拥有明确的价值导向,能够对相关问题进行独立回答的一套思想体系。例如,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以追求利润为导向,回答的是在资本循环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以及分配问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3-703页。

②根据卡斯·穆德的理解,民粹主义是一种“薄意识形态”,其核心思想是关于民众意志(*general will*)的表达,强调“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的对立关系。参见 Mudde C.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0. 本文将“薄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缺乏坚实的价值内核,以信仰人民、反对精英作为共同特征,容易与其他价值观念相耦合的意识形态。

③卡斯·穆德认为,“人民”居于民粹主义的核心区域,人民与精英的对抗关系是民粹主义的显著特征。参见 Mudde C.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1. 扬-凡尔纳·穆勒认为,民粹主义的本质就是反多元主义。参见扬-凡尔纳·穆勒:《什么是民粹主义》,孙静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年,第823页。

④这一表态遭到了土耳其前领导人德米雷尔的批评。他认为埃尔多安把“承认库尔德人的存在”上升为“存在库尔德问题”,已将种族间的差异发展为民族问题。

⑤全球大多数南方国家的共同点是,民粹主义政府上台后,与美国的关系将会恶化。民粹主义者根据其深层的浓厚意识形态,将美国等同于一个跨国精英全球统治的来源和典型。参见 Sandra D, Plagemann S. *Popu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predictability, personalisation, and the reinforcement of existing trends in world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9, 45(5): 711-730.

⑥艾尔丹姆·赛迪莱克对欧洲民粹主义激进右翼领导人外交政策偏好进行编码,利用相关的集会演讲、报纸刊文、以推文为代表的即时评论等实现操作性代码建构;吉恩·克里斯托夫与卡梅伦利用计算机的学习和识别算法,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话语展开研究。这些研究通过对民粹主义修辞话语进行识别、追溯、验证,发现他们具有高度一致的表达技巧和针对目标。参见 Özdamar Ö, Ceydilek E. *European populist radical right leaders' foreign policy beliefs: An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0, 26(1): 137-162; Christophe J, Cameron G. "I am a tariff man": The power of populist foreign policy rhetoric under president Trump. *Journal of Politics*, 2019, 81(2): 712-722.

⑦从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出发,前期条件和相似背景对案

例选取进行了规制(参见叶成城、黄振乾、唐世平:《社会科学中的时空与案例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3期)。现实中,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与印度总理莫迪执政后都推动了本国外交政策的大幅转向,呈现出区别于上届非民粹主义政府的显著特征。

参考文献:

- [1]程春华、张艳娇、王兰兰:《当前西方民粹主义研究述评:概念、类型与特征》,《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1期。
- [2]Mudde C.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04, 39(4): 541-563.
- [3]Mudde C, Kaltwasser C R. *Populism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Threat or corrective for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4]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 [5]Chrysosgelos A S. *Undermining the West from within: European populists, the US and Russia*. *European View*, 2010, 19(2): 267-277.
- [6]Balfour R. *Europe's troublemakers: The populist challenge to foreign policy*. European Policy Centre, 2016.
- [7]Giurlando P. *Populist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Italy*.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Journal*, 2021, 27(2): 251-267.
- [8]Verbeek B, Zaslove A. *The impact of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on foreign policy: The Northern League as a junior coalition partner in the Berlusconi governments*.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5, 7(4): 525-546.
- [9]Wajner D F. *Exploring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populist governments: (Latin) America firs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2021, 124(3): 651-680.
- [10]Wehner L E, Thies C G. *The nexus of populism and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1, 35(2): 320-340.
- [11]Sandra D, Plagemann J. *Popu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predictability, personalisation, and the reinforcement of existing trends in world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9, 45(5): 711-730.
- [12]卢克·马奇:《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于海青、王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 [13]佟德志:《解读民粹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2期。
- [14]项佐涛、李家懿:《认同政治与利益政治的双建构——

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欧洲研究》,2020年4期。

[15]Laclau E.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16]Hawkins K. Venezuela's Chavismo and Popu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7]Hall J. In search of enemies: Donald Trump's populist foreign policy rhetoric. Politics, 2020, 41(1): 48-63.

[18]林红:《西方民粹主义的话语政治及其面临的批判》,《政治学研究》,2018年4期。

[19]Wojczewski T. T populism, hindu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in India: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ing "the peopl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20, 22(3): 396-442.

[20]Geis A, Hanna P. Negotiating German responsibility "at the heart of society"? On the politicization and depoliticization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2017, 41(2): 218-226.

[21]Wojczewski T. Trump, popu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020, 16(3): 292-311.

[22]扬·凡尔纳·穆勒:《什么是民粹主义》,孙静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年。

[23]Žižek S. 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Critical Inquiry, 2006, 32(3): 551-574.

[24]Nabers D, Stengel F A. Conclusion: Populism, foreign policy, and world politics. In Stengel F A, MacDonald D B, Nabers D(eds.)Populism and World Politics.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25]臧雷振、陈鹏:《比较政治学研究选择性偏差及其规避探索》,《政治学研究》,2016年1期。

[26]严天钦:《欧盟成员国拒绝接受穆斯林难民背后的宗教因素探析——以匈牙利为例》,《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6期。

[27]毛国民、刘齐生:《欧洲移民蓝皮书:欧洲移民发展报告(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28]黄丹琼:《匈牙利民粹主义政治极化》,《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4期。

[29]Orbán V. Speech at Baile Tusnad(Tusnádfürdő). <http://budapestbeacon.com/public-policy/full-text-of-viktororbans-speech-at-baile-tusnad-tusnadfurdo-of-26-july-2014/>,2014-07-26.

[30]Ankit P. Foreign policy in the 2014BJP Manifesto. <http://thediplomat.com/2014/04/foreign-policy-in-the-2014-bjp-manifesto/>

ifesto,2014-04-07.

[31]王瑞领、王灿灿:《论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外交政策的调整——基于印度政治发展的视角》,《南亚研究》,2019年4期。

[32]楼春豪:《莫迪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转向及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7期。

[33]孔田平:《匈牙利再转型之谜》,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89563,2018年6月13日。

[34]杨云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对气候治理的影响》,《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2期。

[35]楼春豪:《新冠肺炎疫情与印度对外战略新态势》,《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0年5期。

[36]Kim S. Because the homeland cannot be in opposition: Analysing the discourses of fidesz and law and justice(PiS)from opposition to power.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021, 37(2): 332-351.

[37]Jaishankar D S. Ind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5493/iiss+fullerton+lecture+by+dr+s+jaishankar+foreign+secretary+in+singapore,2015-07-20>.

[38]《匈牙利总理在国情咨文中表示匈要走自己的路》,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217/c157278-24374058.html>,2014年2月16日。

[39]Destradi S, Plagemann J. Popu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Un)predictability, personalisation, and the reinforcement of existing trends in world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9, 45(5): 711-730.

[40]《印执政党开会赞扬莫迪和平解决洞朗对峙:政治成熟》, <http://www.rmzxb.com.cn/c/2017-09-26/1816315.shtml?n2m=1>,2017年9月26日。

[41]赵俊:《国际关系中的承认:合法性与观众成本》,《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4期。

[42]Giorgi D. Rethinking border control for a globalizing world: A preferred future. Punishment & Society, 2018, 20(2): 271-274.

[43]Kriesi H. The populist challeng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14, 37(2): 361-378.

[44]钟准:《把政党找回来——政党与对外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2期。

[45]Moffitt B. How to perform crisis: A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the key role of crisis in contemporary populism.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15, 5(2): 189-217.